

洙泗學人文庫

儒學價值傳統與現代化

姜林祥 著



齊魯書社

2
B 222.05
J47

洙泗学人文库

儒学价值传统与现代化

姜林祥 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价值传统与现代化/姜林祥著. - 济南: 齐鲁
书社, 2002.3

ISBN 7-5333-1111-6

I. 儒… II. 姜… III. 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199 号

儒学价值传统与现代化

姜林祥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22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33-1111-6

B·138 定价: 21.00 元

总 序

宋焕新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是世所公认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与时俱进，绵延发展两千多年，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远播海外，构成东亚文明的内核，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仁者爱人”、“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已经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发掘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吸收与融合，是传承中华文明，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的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学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曲阜师范大学设学于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一向以研究孔子儒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己任。建校近五十年来，孔子、儒学研究从未间断，在科学研究、学科梯队、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是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的挂靠单位，孔子文化学院是国内高校最

早建立的孔子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级重点课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学院办有《儒学研究动态》，定期出版《孔子·儒学研究文丛》，多次举办孔子、儒学研究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重视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00年5月，依托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和孔子文化学院，学校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及海外投资者联合创办了中外合作孔子文化大学，孔子、儒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儒学研究，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大力帮助。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会长、日本友人深见东州先生捐资设立的“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对于促进以孔子文化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为中心的孔子儒学研究，弘扬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国际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读者面前这部《洙泗学人文库》，就是由“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出版的。《文库》共有十本，每本20余万字，是曲阜师范大学长期从事孔子、儒学研究的专职教授和兼职教授从已发表的文章中选编而成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儒学研究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入的。我们期待学者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孔子、儒学研究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作者系孔子文化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曲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

前 言

本集子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编选了 16 篇文章，按其内容分，前 9 篇大体可归为“儒学与现代社会”，后 7 篇大体可归为“儒学在近代中国”，它基本上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我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学术领域，以及主要研究成果。由于受内容和字数的限制，其他方面的论文未能收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人们称之为“东亚模式”。而作为其文化背景的以儒学传统理念为特征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也被提了出来，从而引起了儒学与现代化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观点不一。有“动力说”，有“阻力说”，还有“儒学与现代性二者无关说”。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文化，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不考虑文化因素，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而有的至今经济改革不成功。我们探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一个社会实证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其进行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实证性的研究和考察，东亚经济奇迹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亚洲价值观”，儒学价值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腾飞确实起到了

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人们还不难发现，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还是一个动态的作用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儒学为图生存而被迫进行自我调整以与现代化相适应”。所以，我们毫不夸张地说，经过调整后的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与发展中，其直接的积极作用，仍是不可小视的。本集所选的前9篇文章，大都是为参加这场大讨论而写的，它代表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研究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不能不涉及近代中国。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共10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揪心的年代，西方入侵，列强瓜分，国家处于危难之季，因此，如何救亡图存，如何自强、自立，成为时代主题。可以说“中国的民族脊梁”们，为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实现现代化，苦苦寻求了一个多世纪。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传统儒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衰落、正统地位的丧失以及向近代转换的过程。如果说，面对“五千年来一大变局”，今文经学派主张以经学“治国”，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维新派假借孔子的名义“托古改制”，他们还是从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出发进行变革的话，那么，到了五四运动公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情况则完全不同了，这是向“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以来首次敢向孔子作正面摧毁的千古一变”。从此，儒学两千年来的独尊地位终结了。但是，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并不说明儒学的消亡，而是以它所具有的民族性、致用性、相容性的特点，向近现代转换，以适应时代变局。各种社会思想流派也根据各自的需要而把经过取舍的西方思想移植于中国社会，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互相融会贯通，从而构造出新的思想体系，并企图利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干预中国社会发

展的方向和进程。而儒学也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确立自身的价值以及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后7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对儒家思想在近代社会的价值和地位的基本看法。

最后，还有一个儒家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以及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对儒学在21世纪的历史命运许多中外学者持乐观态度，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即儒家思想威胁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今后世界中，将是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抗，儒家思想对西方最具有威胁性。西方一些知识界人士虽然不同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在对中国的看法上，其偏颇竟如出一辙。在所选的有关文章中，就此问题表明了我的下述看法：我们认为，儒学在新的世纪里，既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也不会对西方文化构成威胁。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讲的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喜欢圆融，不喜欢冲突”，是崇尚王道贬抑霸道的文化，中国从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西方对于中国的偏见，之所以那么根深蒂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对于中国的不了解。至于儒家思想，大部分西方人不要说了解，甚至根本从未听说过。对这方面的问题，凡到过西方国家的中国学者大都感触颇多。因此，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挖掘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其精华部分发扬光大，推向世界，使其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并在未来世界文化建设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广大史学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姜林祥

2002年3月9日

目 录

总序	宋焕新 1
前言	1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	1
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当代社会思想方法	17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39
“以德治国”与“官德”建设	48
儒学与日本企业文化	60
儒学在韩国现代化中的作用	75
儒学与亚洲金融危机	107
儒学与“东方文化中心”论	139
儒学与“文明冲突”论	167
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	195
晚清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	228
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	241
新儒学的兴起及其历史特征	254
毛泽东对儒学的批判继承	265
武训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283
武训评价一百年	292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

21 世纪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如何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有识之士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纪念孔子诞辰 2545 周年的时候，就儒学在 21 世纪的走向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请教于国内外专家学者。

一、20 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

儒家学说和现代生活能否协调？对现代化进程是起阻碍作用还是积极作用？这是自“五四”以来七十余年间一直没有从理论上彻底解决的问题。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争如此，80 年代出现的“儒学热”也如此。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自强、如何实现现代化等问题而展开的。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起始，继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壁垒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便进一步地将中国逼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随之，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

治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而摇摇欲坠，进而被摧毁，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遭到长期扼杀之后，又经由新的内外条件的催发而复萌、发展，甚至在个别沿海口岸出现了一度繁荣的景象。可是，近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受到国门之外的西方列强的干扰阻挠，在国门之内也受到种种怀疑、非难，当然也有支持和欢迎。历史发展到“五四”时代，资本主义并非中国社会的惟一选择。在此情况下，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先进知识分子便积极寻求变革社会的途径，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围绕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未来命运展开了争鸣，并且出现了许多思想派别，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大派：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又叫西化派），一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

上述三派思想家虽然都有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都想开一个灵验的药方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出路问题，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各执一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儒家学说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这里应特别一提的是本世纪 20 年代开始涌现的现代新儒学。其代表人物，在 20 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三四十年代有冯友兰、贺麟，50 年代以后又有唐君毅、牟宗三等。他们回答的也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其共同志向是通过援引西学来重构儒学，欲觅儒学的复兴和现代化。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新儒学体系，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和思想流派。但由于时运蹇剥，他们的努力都收效甚微。

历史进入 80 年代，思想界又出现了一股“儒学热”。这个时期，从中国海峡两岸到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德、法、美

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多次有关儒学的学术讨论会，有关儒学的论文、专著犹如雨后春笋竞相刊布，仅中国大陆几年时间即出版专著百种，论文更数以千计。这股“儒学热”虽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而深入，但国内外相当关心的还是主要集中在儒学在今天和未来的地位及价值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儒学复兴论。认为自“五四”以来，反传统过了头，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价值权威。中国经济之所以屡遭挫折，反儒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必须变反儒为扬儒。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文化资源。有的学者还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已完全背离了西方的模式，是一种国家的、家长制的、反个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儒家思想主要是其伦理道德观念，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仍有机地存在于日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并且对其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起到了巩固和推动作用。他们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东方现代化的模式，即儒家资本主义，足以证明儒学传统可以开出现代化的科学民主之花。

另一种观点是彻底重建论，即主张彻底反儒。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摧毁传统的枷锁，彻底重建新的传统。因为儒学对现代化起了阻碍作用。其理由是：（1）儒学长期阻碍社会的进步，致使封建社会漫长、生产力不发达。具体说，儒家提出的天下为公与大同理想，只是对原始社会农村公社的向往，是开历史的倒车，不能引申出近代民主的观念，相反，却成为导致专制集权的文化温床；以“贵义轻利”和“重道轻器”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价值系统，与现代化的民主与科学是背道而驰的，导向的恰恰是王权主义和使人不成为其人。历

史证明儒家对中国社会起消极和阻碍作用；(2)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之相应的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儒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与社会主义新文化毫无相容之处；(3)东南亚经济的起飞并不是得益于儒家精神，而是战后经济新格局的结果，以此来论述儒家思想的合理性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补上批儒这一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写文章对这股“儒学热”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股“尊孔热”，对孔子评价之高，影响所及，到了自撤藩篱、丧失阵地的惊人地步，使人们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哲学和世界观的界限，甚至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根本区别。

第三种观点就是批判继承说。持这种观点的居多数，但如何具体地批判继承又有许多不同看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既要看到儒学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要使儒学服务于中国现代化事业，必须进行创造性转换。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必须具备以下前提和内容：一是使儒学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文化因素，发掘儒学中富民、立功和廉洁等积极因素；二是使儒学与科学、民主、法制、教育等现代文化内涵结合起来，克服其封建因素；三是中西文化相兼互补，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使中国文化在扬弃传统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儒学的理想人格和道德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有借鉴作用，而且还具有永恒的道德价值，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

80年代儒学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对儒学的研究与弘扬；西方国家面对出现的道德危机，出现了一股回归传统的思潮，他们视儒学人文主义为同调，从而推动了儒学在东

西方之间的双向流动；华裔学者的民族“寻根”意识，对推动儒学走向世界，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大陆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而出现的“文化热”、“儒学热”，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注意。可以预见，80年代出现的这股儒学热将会持续深入地向前发展，并将走向21世纪。

二、儒学在21世纪的存在和发展

儒学在21世纪的发展和走向问题，也是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从中国和亚太地区以及西欧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在世纪之交的变化趋势看，下一世纪，儒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儒家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人们建立未来全球社会的信念有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孟到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都有一个五湖四海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理想，尽管他们心目中各有各的理想社会蓝图，但他们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了一生。

孔子的理想蓝图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主张建立的是一个不存在宗法关系、人们为集体而劳动、社会安定、和平幸福、富于人道精神

的国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所主张的即“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的社会。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也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

这里，我们有必要突出强调一下孔子从仁学出发，提出来的“和”的观念。“和”就是普遍和谐。它含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人与自然。主张人与宇宙或自然应和谐一体，即所谓天人合一。第二个层面是国家之间。国与国之间应该是修好和睦，和平共处，即所说的“和为贵”。第三个层面是人与人。人际关系要和美协调，做到相互理想、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共同成长。第四个层面是指身心关系。身心内外应和谐一致，追求一种平和、和乐、中和的境界。孔子关于“和”的观念，在当今世界和未来社会其社会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目前，西方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不少人对前途忧心忡忡，六神无主的失衡心态，恐怕其症结就出在“和”的四个层面的不和谐上。

当然，我们现在离实现全人类共同生存、荣辱与共的大同世界还比较遥远，但当大家都在急于找寻一条出路的时候，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从而树立起向全球性社会迈进的信心，还是很有意义的。

（二）儒家的义利观和惠民思想对未来的现代化经济管理仍具有启示和使用价值

孔子重义轻利，强调仁义道德的价值，但他没有完全否定利，相反，他充分肯定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①可见，尽管孔子“罕言利”，但对于可求的“富足”，甚至可以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

但同时，孔子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他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去谋利。对利益的追求，要合乎道义，不能不择手段。孔子还提出惠民论。他主张应关心劳动群众的实际利益。认为凡是追求社会的利益、满足社会需求的行为，才是合乎“仁”的、道德的。反之，无视社会利益而聚财，则是不道德的。

儒家的义利观已被许多企业家成功地运用到现代经济管理当中。例如，号称“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一生参与创立的企业达 500 多家，他在长达 43 年的惨淡经营中，始终坚持“论语加算盘”的理论，换言之，就是“道德经济合一论”。涩泽荣一对《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富贵”是“人之所欲”，因而是“有价值的”，连圣贤也不反对。但他接着又说，关键在于取得富贵的手段是否合乎“道”，如果“以其道得之”，就不应该笼统否定。涩泽荣一解释说，这个“道”指的是“公共利益”，即国家利益。他认为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增殖资本，如果对增强国家的实力有利，就是光荣的，即符合“大义”。涩泽荣一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武士精神）和“商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统一起来，从而把旧的贱商的“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涩泽荣一“论语加算盘”的理论，至今深深影响着日本企业家。他所著的《论语加算盘》、《论语讲义》等书，至今是日本、企业界的热门书。^④

儒家思想运用于现代化企业管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中也有成功之例。《光明日报》1994年7月2日至7月21日连续发表的《薛永新与恩威企业文化精神》的长篇报道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从四川贫苦农民家庭出来的薛永新，1983年揣着仅有的20元人民币，到成都开辟自己的天地，短短七八年间，几经波折，他创建的恩威公司以飞跃的速度发展成为总资产近4亿元，年产值近3亿元的现代化企业。恩威的产品在国内享有重大信誉，它生产的洁尔阴被称为“东方神药”。恩威公司的义利观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恩威公司企业管理的特点是：采用“顺乎自然”的思想，管理企业，介入市场；像疏导流水那样，调谐员工的智慧与能力；以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的精神，处理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产品与顾客的关系。可以说，恩威公司是把中国传统儒道精神运用于现代化企业管理的成功范例。有人把薛永新同日本松下公司董事长、举世闻名的现代企业传奇人物松下幸之助相比较，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大量报道的中国比较成功的现代化企业，其管理经验，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关。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中国，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融西方先进管理经验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经济管理模式定将放出异彩。

（三）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对未来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仍有积极作用

孔子人生最高理想是“成圣”，或者成为“仁人”。“圣